

大家小书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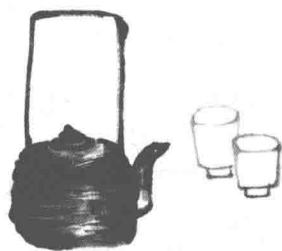


周作人概观

舒芜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周作人概观

舒芜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作人概观 / 舒芜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7.7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2696-9

I. ①周… II. ①舒… III. ①周作人 (1885—1967)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4112 号

总 策 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王忠波 秦 裕
责任印制 宋 超
装帧设计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

· 大家小书 ·

周作人概观

ZHOU ZUOREN GAIGUAN

舒 芜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36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2696-9

定价: 2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

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庾信文章老更成

——舒芜的周作人研究

黄开发

周作人研究在中国大陆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而逐步展开的。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或多或少地受一个观点的影响，就是认为周作人留给后人的主要是历史的鉴戒。研究的途径则是把周作人附逆下水作为起点，然后回过头去看他的一生。鲁迅和周作人的比较研究一直颇受青睐，他们在“五四”和“五四”以前就存在歧异，经过新文化战线的分化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而分道扬镳，从而走向不同的结局，这似乎成为深受政治革命理论框架影响的新文学史的极好的注脚。这种研究态度和思维方式在周作人研究中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典型性，并且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仍有余绪，是影响周作人研究拓展和深化的制约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进步依赖于对这种研究态度和思维方式的克服。

我很愿意把舒芜的周作人研究放在这样的背景中谈论。舒芜的周作人研究起步不算早，然而他是带着相当的积累和准备加入到当时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的，并取得了众所

瞩目的成果。《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原以《周作人概观》为名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六年第四、五期，是作者的第一篇周作人研究论文，在当时可谓横空出世，在文化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该文的意义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充分地肯定了周作人的地位。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方面，周作人的“成就和贡献都是第一流的，开创性的”，“别人无可代替的”，“将永远成为中国新文化宝库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之所以要研究周作人，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因为“鲁迅的存在，也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因为“周作人的悲剧，则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对周作人研究意义的肯定其实也就是从另一角度对其自身地位的肯定。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给予他如此多的评价。第二，虽然全面介绍和评述了周作人，但它更重要的在于探索了“解决好问题的态度、尺度和角度”。文章突破了政治革命的理论框架，突出了研究对象自身的主体地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清对象自身的价值以及丰富性、复杂性。在写作上采用短章节的方式，全文共分二十来节，表面看来似乎分得过于琐碎，然而却在全面介绍、评价周作人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好处在于腾挪转换自如，涵盖了周作人文学、文化和人生道路的各个方面，不同的方面正好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周作人的塑像。当时，

一般研究者对周作人知之甚少，头脑中有关的信息无外乎他是鲁迅的弟弟，写过小品文，后来堕落成了汉奸。舒芜的文章自然会使他们惊奇：周作人原来是这样！他们也就有兴趣去做进一步的了解。

对研究者来说，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的价值天平上不能不充分顾及到周作人附逆的事实，总结周作人道路的教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肯定他的功绩和价值，并非有意忽略或淡化他的不光彩的一面，而是要把它们各自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中，舒芜就试图总结出周作人悲剧的性质。在《理性的晴朗和现实的阴晴——周作人的文化心态》中，他以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式的理想与二十世纪悲观的现代意识的矛盾对立作为切入点，探讨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和精神结构。作者告诉我们，周作人对自己文化心态的矛盾最为自觉，故能凝视荒诞的现实，坚持理性的观照。然而这种明净的观照，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完全缺乏行动性，在血与火的时代，不能成为大众的引路人，并且会使自己在湍急的旋涡中缺乏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这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探索周作人道路悲剧的原因。舒芜还对周作人的附逆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有一篇文章《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此文的特点是主要通过周作人的日记说明他在一九三九年元旦的遇刺是中国方面对于附敌者的惩罚，揭露周与进驻他家的

侦缉队之间的微妙关系和这个自称“沉门托钵的老僧”的奢侈生活。其文鞭辟入里，时见诛心之论。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因为《周作人日记》的版权问题而未能收入集子。以后有论者把舒芜的一些观点概括为“唯文化论”，说他有意夸大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刻意抬高文化的地位来代替历史的尺度，从而为周作人的附逆辩护。这位论者大概是没有读到《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一文吧。^①另外，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也都渗透了作者的是非标准，他的肯定也往往是批判的肯定。

周作人最为人道的恐怕要数散文，散文也就是他思想的最主要的载体，研究者不管其兴趣何在，首先接触的是散文。然而，这依然是周作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周氏是古今中外的通派，他的散文融合了诸多复杂的思想艺术成分，这些成分经过其人生道路变化的折射更呈现出扑朔迷离的色彩。因此，能否较准确、深入地把握他的散文艺术是对研究者功力的一个考验。舒芜这方面的工作是出色的，他的贡献大约有三。一、是对周作人散文平淡与不能平淡，闲适与不能闲适的辨析。很多人喜欢用“平淡”“冲淡”“闲适”这样的概念来标识周作人散文的艺术风格，而缺乏对其中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准确、完整的描述。舒芜

① 有兴趣的读者可翻看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的《鲁迅研究动态》。

在第一篇论文中就较多注意到他的平淡里包含的苦味，苦涩中蕴含的腴润之美。到《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他把前面的论点铺展开来，显示了可贵的进步，他充分谈论了包含在“平淡”中的复杂性，“平淡”和腴润的成因等。二、肯定了周作人后期散文文体上的成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周作人多有抄书之作。在舒芜以前，认为周作人后期散文不足道差不多成了定论。《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中写道：“周作人晚年许多读书笔记之类，往往通篇十之八九都是抄引古书，但是加上开头结尾，加上引文与引文之间的几句话的连缀点染，极萧寥闲远之致，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的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两个鬼的文章——周作人的散文艺术》再次称赞周作人晚年“创造出一种前无古人后亦未必有来者的文体：即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抄引古书的文体，所谓‘文抄公’的文体”。据我所知，舒芜是新时期最早对周作人后期散文做出肯定的，尽管他还没有展开进行具体的研究。周作人后期散文中确有一批深折隽永之作，像《赋得猫》《关于活埋》《无生老母的信息》，他自己一直颇为看重。这种散文的写作与他后期退回书斋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其外表枯澹，苏轼《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云：“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周作人的散文做到了“外枯而中膏”。三、对周作人散文艺术

的具体分析也有不少精彩之处，这里我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舒芜是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代表人物，所受的批评和攻击最多。有人进一步追查“出身”，把舒芜的周作人研究与他本人的经历和心态联系起来，大发“诛心之论”。有人在文章中暗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舒芜“选择周作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是饶有意味的”。有人在论文中写道：“在舒芜的周作人研究中，几乎看不到实质性的反思和批判。对于周作人的人和文，他所流露的是不加掩饰的欣赏和同情，以及藏在欣赏背后的自我辩解。舒芜是把周作人看作精神导师而大加推崇，其中原委不言而喻。对于晚年的舒芜来说，周作人研究已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以这种方式，舒芜实现了为自己辩解的目的。”由于没有实际的论证，这种“诛心之论”最终沦为了一种莫须有的猜度。其中，有的人是在有意抹黑。一个研究者分析了道德实用主义给学术研究的妨害，并评介周作人对此问题的审视和批判，指出：“他所强调的求知态度并不排斥道德原则，所反感的只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傲慢罢了。”^①“道德的傲慢”普遍存在于周作人研究中，借用周作人在《论笔记》一文中的话来说，“道德的傲慢”表现在某些人身上就是一种“教徒气”——头顶某种道义的

^① 符杰祥《“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东岳论丛》2009年第5期。

光环，度量褊狭，性情苛刻，偶尔现出“正统派的凶相”。

舒芜对周作人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收入了其论文集《周作人的是非功过》^①，共十一篇文章，是对他五年间周作人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这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这是一个饱经人生磨难的知识分子，带着强烈的人世精神和关心现实人生的情怀，对新文学、新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所进行的思考。这里没有丝毫迟暮之气，立论大胆新颖，敢为天下先，又铅华洗尽。展读此书，让我想到了杜甫的名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自然，“老而更成”是非常不容易的。

^①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2010年4月改版（收入“猫头鹰学术文丛精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印行增订本，增加论文1篇，加了一个“附编”，含学术小品19篇。

目 录

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

——周作人概观 (1)

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阴暗

——周作人的文化心态 (112)

两个鬼的文章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 (159)

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

——周作人概观

—

周作人是谁？今天中国青年读者恐怕不少人答不上来；有些人能答出一点，大概也只说得他是鲁迅的弟弟，也是个作家，很不争气，堕落成了汉奸，如此而已。如果告诉他们：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后来虽然暗淡了，但是，左翼作家当中眼光深远的，对他的学问文章仍然给以很高的评价。据周建人回忆，抗战前不久，冯雪峰还表示过这样的意思：“周作人是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①后来，抗战爆发，周作人留在沦陷了的北平，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出处，郭沫若在上海发表了深情怀念周作人的文章，引用古诗“如

^①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可赎兮，人百其身”，说是只要周作人脱险南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①可是，五个月后周作人就辜负了这些关心，背叛了祖国；而郭沫若当时正是冒险从日本潜回祖国来参加抗战，为爱国青年所敬仰的。今天的青年听到这些情况，恐怕吃惊不小，将信将疑。其实，这都不是太远的事，文艺界八十岁以上的老前辈们，都亲身经历过周作人的名字闪闪发光的时代。

那么，是不是要责怪青年对历史的无知，和极左文艺思想对历史的歪曲呢？当然二者都是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周作人的确在祖国呼吸存亡之际，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受难的人民，这是无可原谅的，不能不受到惩罚的。一代两代青年忘记了他，或者只知道他的罪恶和丑恶，这个惩罚对于他是轻了还是重了，都很难说，反正一切咎由自取，只该他自己负责。人民不可侮，历史不可欺，而历史的无情的规律不一直都是通过人民的明智和公平，有时反而是通过迷乱和偏激，曲曲折折地体现出来。

然而，历史又是有情的，公正的，这也常常是一个“曲线中的直线”的进程。近些年来，研究周作人的论著陆续发表了，周作人的历史功绩逐步透露给青年读者了，周

^① 郭沫若《国难声中怀知堂》，载1937年8月30日出版的《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第一期，转引自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载《南开学报》1983年第2期。

作人作品的选集也开始公开出版了。大概，一个历史人物如果既有无可原谅的罪，也有不容抹杀的功，那么两方面的账，都会一笔一笔记在历史的大账本上；一时之间可能只有某几页被揭开，另几页被掩住，但是迟早总会一页一页翻开，来一番总清理，哪一笔也漏不掉，错不了。

周作人这一本账，现在看来是可以动手清理的时候了。这是很值得做的。因为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鲁迅的存在，也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不了解周作人，也不可能了解一个完整的鲁迅。至于周作人的悲剧，则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

周作人这本账又是很不容易算的。它太复杂了，太矛盾了，随便一想就是一大堆的问题。周作人的一生是连贯的，还是截然两段呢？截然两段的事当然不会有，那么，互相连贯的前后两个时期，是非功罪为什么这样相反呢？是前面有假，还是后面有冤呢？是先前侥幸成名，还是后来偶然小误呢？是无可理解无可论证的奇人异事，还是从错误到罪恶、从脱离人民到背叛祖国的完全说得清的发展呢？对于周作人的历史功绩究竟应该怎样估价呢？估高了，会不会同后面一段更加矛盾，更加难以解释呢？会不会减

轻了他后来的罪恶，冲淡了人们的义愤呢？估低了，又怎样解释他当时在青年心目中的形象的辉煌，怎样解释在他尚未背叛祖国之前，革命作家们一直还给他以崇高的评价呢？周作人究竟怎样走上背叛祖国的道路，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呢？怎样在他前段历史里寻找根源，做出科学的说明呢？还有，探讨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是仅仅具有历史的认识的意义，还是为当前的文学和文化事业继承一份不应该拒绝的遗产，为现实的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呢？

这样一大堆问题（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要想一个一个都解决好，不是短期间做得到的。现在只能在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做一些初步的探索；其实还不是探索问题本身，只是探索一下怎样解决好问题的态度、尺度和角度。

二

究竟怎样来估价周作人的历史功绩，是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今天要研究周作人问题的一个前提。历史上的汉奸有的是，其中也不乏先前有过某种光荣历史的，他们都没有多少好研究的，至少不需要作为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大问题来研究。而周作人问题却是这样的大问题。正因为他在我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有过很大的历史功绩，否则这个研究根本就不必要了。

上面说过，一代两代青年忘记了周作人，那是他自取